

气象战争叙事的摇摆与桎梏

□任沛梓

电影《诺曼底72小时》从军事气象学的切口,跟随气象学家斯塔格的视角,身临整场登陆战的“高气压”。然而,电影中的人物、情节与视听设置没能跳出原有对历史战争叙述的范畴,在同题材作品中略显重复和局限。

应该说,影片对斯塔格的塑造非常丰富,莽撞、固执但又冷静果决的斯塔格要面对盟军司令部的压力,要面对共事的气象学家克里克的压力,也要作为“护妻狂”承担家庭安全的压力。然而,为了满足对斯塔格的人物叙述,影片在人物群像的设置上或多或少地让步于功能。

首先是斯塔格与克里克。在影片前半部分,克里克被刻意地削弱为一个忽略变化要素,丧失学术能力,只会按图索骥的傲慢人物;而到后期,斯塔格突然就选择了和克里克再度合作,相信并依赖克里克的学术能力。这种在人物功能性塑造上的明显矛盾,让叙事显得生硬。其次是影片的一位关键女性角色凯·萨默斯比。在斯塔格与同事博弈的过程中,萨默斯比一直作为一个消减对抗和冲突的助理角色,是整个气象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平衡者。然而,她在电影中的很多动机都存在过的功能化:在艾森豪威尔权衡对斯塔格的信任问题时,萨默斯比只是一味地强调“你要相信他”;而在面临登陆作战是否如期进行的关键节点时,萨默斯比因为要稳定斯塔格的情绪提出要帮忙探望他的妻子,向艾森豪威尔“要起了脾气”。萨默斯比在影片中过度感性,在对斯塔格的支持上缺乏理性的理由。

在电影《诺曼底72小时》中,导演马拉斯在叙述历史时选择让斯塔格做主角——一位我们无法在教科书所浓缩的历史事件上直接看到,却无法在战役内部直接被关注到,却在整个战役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导演想要尝试跳出常规类型,在“宏观或微观”中选择“或”这个叙事解法,从而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44年乌云笼罩的诺曼底。不过,当我们再次回顾整个电影,在斯塔格本人与气象、与同事和上司演对手戏的舞台间,影片插入了许多舞台之外的要素。这种“全都要”的加法,削弱了电影叙事视角的创新,也让影片重陷先前战争类型片的叙事窠臼,使整部影片成为“四不像”:不像类型片,不像战争片,不像新视角,不像旧套路。

为什么要做这种加法?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斯塔格叙事线的薄弱与生僻。为了增添情节上与观众的亲和性,导演就需要增添类型叙事,把控节奏,放大人物关系的矛盾、感情的作用,作为对观众理解叙事的补偿。当导演意识到纯粹的气象学术语博弈可能造成普通观众的疏离时,便转而依赖家庭危机桥段制造情感牵引,并插入战斗场面提供视觉刺激,结果便是,影片未能坚定地沿着自己开辟的“认知博弈”新路径走下去,而是在中途不断回望并捡拾传统类型片的元素,最终使得作品沦为政治戏、对手戏与战争大片的拼贴实验。这种类型上的摇摆与驳杂,不仅是叙事技巧的失当,更深层地反映了在商业电影生产体系中,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创新所面临的内在不自信。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学生)

最新上映的影片《诺曼底72小时》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聚焦诺曼底登陆背后不为人知的气象博弈。安德鲁·斯科特饰演的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顶住重重压力,精准预判风暴间隙的窗口期,以一纸气象报告守护数十万盟军将士安危,这一关键决策深刻影响了二战走向与战后世界格局。短短72小时,天气骤变、军令重压、战局危机层层叠加,每一次判断、每一次迟疑,都牵动着世界格局的走向,极致高压的剧情节奏,让观众身临其境,亲历这场改变战局走向的生死博弈。



艺苑论剑

高压之下



诺曼底72小时

比冲锋更紧绷的张力

□田照麟

一部关于“等待”的战争片,如何制造比冲锋更紧绷的张力?《诺曼底72小时》的回答是:将镜头对准战前的海平面气压图。影片聚焦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在诺曼底登陆前七十二小时的决策过程,以近乎文献剧的克制,凝视一位科学家在战争机器中的智识负重与伦理抉择。它关心的不是“打赢”的瞬间,而是构成胜利前提的那种紧绷的气象预测,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然系统,人如何做出判断,又为此承担什么。

在人物塑造上,斯塔格的形象塑造紧扣他作为气象学家的认知方式。影片多次呈现他俯身在海平面气压图上,指尖划过等压线,口中吐出的不是确定答案,而是“极有可能”“风险在增大”“窗口或许会出现”。这种语言与军方决策层形成根本性的不兼容——艾森豪威尔需要一个“可行动”的确定答案,斯塔格提供的却是概率语言与可信区间的罗列。冲突的实质是两种知识范式的碰撞:以行动为导向的确定性文化,与以观测为基础的的概率性思维,彼此都无法完全说服对方。斯塔格的“犹豫”不是软弱,而是对科学边界的高度诚实,他的专业不在于宣称准确,而在于拒绝伪装成准确。

视听语言紧密服务于这一认知主题。空间封闭在气象分析室与会议室中,墙上钉满气压图和水温记录,桌面上电传机不断吐出观测数据。镜头常停留在这些纸张上,让观众阅读被圈出的异常值与被标出的低压区,抽象的气象信息变成了可见的视觉文本,数据获得了质感与重量。光线处理采用散射弱光,画面始终处于“似明未明”的状态,精准呼应气象预测中“能见度不足”的认知处境。大量固定机位的中近景将斯塔格框定在图表与仪器之间,前景常被气压计或电文

个体的战场

□董智昂

电影《诺曼底72小时》聚焦诺曼底登陆前72小时的指挥中枢,以气象官詹姆斯·斯塔格为核心,讲述登陆日期临时推迟的幕后故事。影片将战场对抗收敛于个体内心,其外文片名Pressure,既指向变幻莫测的天气挑战,也暗喻角色背负的沉重心理压力。

斯塔格作为首席气象官,秉持严谨的实证思维,做事不喜外界干扰,这份特质让他在指挥中心屡遭排挤,难以获得信任。艾森豪威尔麾下的气象学家克里克则依靠过往经验与历史数据预判天气,因在北非战场的出色表现备受重用。二人理念相悖,也折射出同盟内部的分歧。

两次汇报决策会上,斯塔格与克里克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斯塔格的预测建立在严谨数据与气象变化的跟进观测上,克里克则仅凭历史时期的类似天气模型作为证据,因此,斯塔格无法认同诺曼底登陆的原定作战日期,在他看来,

遮挡,人物仿佛被信息重重围困。特写镜头集中于面部微表情的细微失控,如眼睑的跳动、嘴角抿紧的线条,它不阐释心理,而是暴露心理的生理痕迹。声音设计摒弃旋律性配乐,主导听觉的是风雨声、电传机敲击声、翻纸的窸窣声,共同构成精密的声音系统。弦乐仅在决策临近时以极低音量浮现,仿佛大气压本身的震颤。

叙事结构上,影片严守七十二小时线性推进,以字幕不断提示时间刻度。这种倒计时并非制造悬念,而是将人驱逐出“结果已知”的安全范围,迫使注意转向“过程如何发生”。每一次气象通报更新与高层争论,都构成一个认知单元:新数据出现,各方解读,矛盾激化,暂缓决定,等待下一组数据。这种“观察、解读、暂缓、再观察”的循环,重现了科学活动中“假设、检验、修正”的认知节律。影片不设间谍、不造背叛,最大张力藏在重复而枯燥的流程内部:一个人如何在信息的逐步明朗与反复动荡中守住专业判断。七十二小时的压力被分解为无数次微决策的累加,给哪个气象站发电报、询问观测细节如何措辞、图上冷锋线的具体位置、异常数据是否纳入推算,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携带着全部决策的重量,叙事由此获得递进式密度的肌理:看似平静,实则每个瞬间都可能成为分水岭。

电影最终触及的主题,是“不确定性的伦理”。影片最终提示观众:在那些由将帅与士兵书写的历史转折点上,还站着一些人,他们不扣动扳机,也不发布命令,只是克制而坚定地说“再等一等”或“现在,可以了”。说这些话所需的勇气,不亚于冲锋陷阵,因为它要求一个人独自站在知识边界的暗处,默默承受异于常人的压力,却只以测量和推算作为回答。这便是影片所致敬的。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定作战日期的天气状况将会异常极端,从而导致斯塔格的神情与言行,都显现出异常的凝重与犹豫。反观克里克的胸有成竹,使他在气场上更易收获信任。但反复推演的结果终究让斯塔格树立信心,在与艾森豪威尔的再次对峙中,他不再退缩与怯懦,而是用坚定的眼神与郑重的语气捍卫自己的立场。从教堂外的独自为营、作战室里的屏息凝神,到成功消息传来时的释然欣慰,皆体现了斯塔格在理性与科学精神下的坚守。

萨默斯比作为片中占据重要分量的女性角色,始终站在客观理性角度审视一切,她十分同情斯塔格被隔绝于利益圈外的现实处境。影片中,当斯塔格受到质疑,她始终站在情感关怀角度,在斯塔格与艾森豪威尔之间起到沟通作用。

当谈及诺曼底之战,人们更多记住的是军事将领们的功绩,但影片中讲述的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小人物,同样值得被挖掘和铭记。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学生)